

经济问题

经济发展的两条路线

叶 伯 乐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广泛深入地展开。由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有一股是所谓“经济台风”，妄图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刮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邪路上去。本刊这一期发表的外论，一篇是谈中国经济问题的，题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探讨》；一篇是谈东德经济问题的，题为《退回到利润的老路上去》。把这两篇文章对照阅读，并同那股右倾翻案风加以联系，颇能发人深省。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东德应该说是一个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了吧？它不但有希特勒德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化的雄厚基础，而且又在这个基础上干了三十年，当然是很现代化的了。而在旧中国，现代工业却少得可怜，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穷二白”；经过解放二十多年的努力，面貌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也还只能说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离开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奇怪得很：那个高度现代化的东德却越搞越糟；而并不那么现代化的中国则越搞越好。单是这一点，就够人们深思了。

东德是苏修的势力范围，苏修把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东德人民，因此，尽管东德工业早已现代化了，但是由于在一九六三年按照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实行了所谓“新经济体制”，到一九七〇年就发生了“经济严重失调的

危机”，以至于市场上连牙刷也买不到，更不要说其他日用工业品了。在东德的企业里，“可以不靠增加生产，而靠公开或暗中提高价格，用损人利己的手段多赚钱”；因为利润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核心”是“灵丹妙药”。生活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下的东德劳动人民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工业固然现代化了，而劳动人民却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如果说，无产阶级追求的是这样的现代化，那和拿绞索往自己头上套又有什么两样？马克思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6—477页）。今天的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一些国家，越是现代化，劳动人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就越重；那种所谓的现代化只会加剧“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因而也是畸形的，漏洞百出的。苏联、东德经济一再出现比例失调，都是证据。

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历史已经宣判它走不通了，但总是有人想走。这也是事实。刘少奇、林彪一类想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想走。他们摆出架势吓唬人们说：“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好家伙，真是世界末日将临，天就要塌下来了。可是，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呢？他们的答案尽管各式各样，但归根到底是取消阶级斗争为纲，搞利润挂帅，搞物质刺激，搞管卡扣罚，搞专家治厂这一套。这条现代化道路，苏联以及东德这样一些国家不是正在走吗？《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探讨》一文的作者，远比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高明，他说：“中国虽然穷，但强调的不是经济第一而是政治第一。中国急需提高生产，但却不为生产而生产。在正确路线受到干扰时须要斗个明白，不惜少产减产。这一点是中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主要不同之处。”这一段话除了“不惜少

产减产'不合乎我党实行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以外,都是对的。我国当然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已经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正式规定下来了。但决不能走苏联、东德这样一些国家的路,而一定要走毛主席为我国人民规划的金光大道。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为了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就要彻底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复辟资本主义纲领,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那股右倾翻案风打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永远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探讨

〔西柏林〕喻钟烈^①

“两条腿走路”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后可以说是走上了“正途”。它已找到了规律，有了动力，因此它今后的发展是乐观的、远大的。所谓“正途”就是“工农并举”、“土洋结合”和“群众路线”。规律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必须“两条腿走路”，而推动力就是不断的革命与阶级斗争。

这些话乍听起来似乎在喊口号，在旧调重弹。详细审视，才知道它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在中国获得实践而在实践中又屡受反对、打击和挫折，直到文革后才能彻底在中国推行。由此可见，要认识客观规律是多么不易，认识了以后，要彻底去执行，又是多么的困难。

“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是基于对立统一的规律，也就是辩证的规律。如果我们说中国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对立统一体，那末，在这个统一体内对立着的正是工业与农业。面对着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统一体，我们可以主观地拟定两种不同的经济政策。简单地说，第一，优先发展工业，不惜牺牲农业；第二，工农并举，互相支援。在选择这两个政策之前，要先考虑中国

作者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的国情。假若中国是象新加坡那样的国家，农业在全国总生产量中所占比例极小，农业人口又少，不妨先用第一种政策。可是，中国地大人多，农业在总产值中占比例极重（一九四九年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至今仍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多，是千万不可执行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因为这将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发展工业，那末工业建设的目的又何在呢？要执行这种政策，只有一个可能：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国家。这样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农业，还可以向外扩张。譬如让东南亚所有的农业国家来做中国工业发展的垫脚石——做原料供应地与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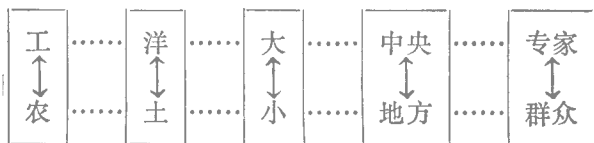
中国不采用第一个而执行第二个政策，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明显地指出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对内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对外防止扩张侵略。因为农业既是工业原料的来源，又是工业产品的市场，有了发达的农业，工业自能稳健地发展，当然不需要向海外扩张了。中国敢说现在，甚至将来都不做超级大国，这是有根据的，不是在唱高调。

可是经济政策是由人制定的，也要靠人来执行。如果人的思想变了，政策也会变。政策一变，经济发展的方向将跟着变，意即第一种经济政策可能代替第二种政策。那末，中国将为此质变：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甚至变为帝国主义国家。这正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基因，而这斗争却事关中国前途以至世界命运。因此中国虽然穷，但强调的不是经济第一而是政治第一。中国急需提高生产，但却不为生产而生产。在正确路线受到干扰时须要斗个明白，不惜少产减产。这一点是中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主要不同之处，也是很多人，包括国内的人民难于理解的地方。譬如，有很多干部犯了业务主义的错误，还以为自

己勤劳无过。

话再说回来，“两条腿走路”的内容不只是包括“工农并举”。要办到“工农并举”，还必须要有一系列也是一分为二的政策，去配合它执行才能有效。首先要“土洋结合”。譬如农业要用土法炼钢铁、就地生产农具等，不能全部仰仗工业。工业必须大力支援农业，尽量提高农药、化肥、拖拉机……等的生产。既然如此，就得大小各型工厂一齐建立。不能只要洋的、大的，不搞土的、小的。大厂需资金多，让中央去办；小厂便宜简易，让地方去干。那末，办工业就得要有两个积极性：既要中央，又要地方。在中央大厂里用洋法生产得靠专家，在地方用土法办小厂就得靠群众。因而不能只靠专家，不顾群众（土专家）。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这一系列的政策列表如下，以便看清它们内部及相互间的联系与辩证的关系。



工农、洋土、大小、中央地方、专家群众正是一对对的两条腿，又是一组组的对立统一体。它们既是独立的，又是彼此相连的。而在各统一体内，譬如工农是对立的，却又是统一的。在中国，工农相依，二者不能缺一。但彼此间又是矛盾的：农业的生产力总是落后于工业，工农产品价格有距离（剪刀差），两者的收入间也有差别……等。可是工农的对立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会逐渐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当农业的生产力显著地提高后，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会逐渐减少；而当城乡差别消除之后，这矛盾就会全部消失。目前的问题在于工业应如何支援农业，农业本身又应如何努力

去达到这一个目的。可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在中国是一个艰巨长期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成的。因为中国工业对农业的依赖性比较强，就是说，农业丰收或歉收可立即影响来年工业的发展；而工业发展情况的好坏又会反过来影响对农业的支援，也就是说影响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工农业就是这样相反而相成，是如此既对立而又统一的。

工业既然这样重要，就必须全民去办，让它遍地开花。不只在工业部门要办工业，在农村也要靠土法生产工业品。工业本身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土到洋、从小到大的过程。今天的洋可能是明天的土，土发展下去就是明天的洋。为此，不应小看农村的土法生产。我们今天去中国观光，随处都可以看到极象样的地方工业，它们都是土发展而成的。很多公社的农机厂也是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从两间破屋发展到宽敞的厂房。一句话，工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土到洋、从小到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千百万的农民就地变了工人，土专家成了洋专家，使大多数人普遍地掌握了工业技术。单是它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已经是深远而不可估量的！因此大小、土洋、专家群众是对立而又是统一的，也是可转换的，不断地演进的。

再说中央与地方，其道理也是相同的。没有地方何来中央？没有中央又怎能地方？它们两者之间也是既相反又相成的。让地方办大厂这是苛求。如果中央连几个人、几十个人经营的小工厂都要管，那也是多余的，就是要管也管不好。中央与地方应当各尽其力，各用其长。这样非但大小工厂都能办，且动用了两个积极性，调动了两处的人力、物力、财力，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地方工业（包括农村的）有了发展就会购买更多中央的工业产品，尤其是生产资料如汽车、工厂设备、建筑材料、电动机、发电机……等。为满足中国拥有八亿消费者这样庞大

的国内市场的需要，中国工业将发展为世界一流。这是可肯定的。今天中国地方办的小化肥厂的产量已超过全国总产量的六成，小水泥厂过了半数，各省地方造的汽车有三十多种，拖拉机四十多型，这都是可喜的消息。而这些产品又是用于支援农业的，这样工农就挂上了钩，互相支援，终会走上轨道，形成自动的循环。工厂生产愈多，购买农业的原料也愈多。农民收入因此增加，就会更多的购买工业品。农民买得多，工厂必扩大，农民转业为工人的人数也会逐渐多起来。农村人口减少，这又反过来迫使农村生产力再提高，意即买进更多的拖拉机、化肥……等去代替减少了的人力。生产力的提高直接促进农产品的增加，间接使农民收入再往上升。这样农民将有购买力买进更多的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工厂为此必须扩大生产而将购置更多原料……如此循环不已，工农收入差别将缩小，城乡距离会逐渐消失。这不但能解除工农之间的矛盾，且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

这虽是远景，但不是幻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正确的经济政策非常重要，否则就会走回头路、走歪路，而这两条路都在文革前走过，文革后才幸好又走上了正途。这是中国之幸，也是世界的好运。要不然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变成一霸的世纪。那末，中国百多年来反帝、反压迫、反侵略的革命都将付诸流水。中国虽富，中国人将再堕落的。

政治挂帅

以上是就经济而言经济，多少有点机械论的腔调。在现实中，任何经济行为都脱离不了人与社会，因而也就离不开政治。我们已经说过，在中国能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是因

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此社会中，是没有私有生产资料的。可是，私有制度在中国已存在了起码三千多年，它的影响当然是深固的。在消灭了它二十年后的今天，这影响还经常在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如果不扫清这些遗风流毒，它就会透过人的思想去左右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没有私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靠私有观念，如金钱至上、剥削有理、个人主义、升官发财……等去办工业、去搞农业，这一定会矛盾百出的。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同私有思想的遗毒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单是铲除私有生产资料，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两点：第一，有私有生产资料就是有符合私有生产资料的思想、看法、言行、道德标准……等。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内容；第二，当私有生产资料经革命被消灭后，属于它的思想却并不会机械地随着消灭。大部分将仍然留在上层建筑里继续的影响人们的看法和言行。换句话说，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后，上层建筑不会马上跟随着全部转变的。所以还得靠人们自觉的行为（主观能动性）去除旧建新，也就是说要主动地在上层建筑里搞革命。过去二十六年来，中国一方面虽在大搞建设，另一方面却从不停止搞革命，并在革命中去改变人们的旧思想，然后再用新的思想去搞建设，去促进生产。这样，上层建筑就在为经济基础服务了，而稳健的经济基础又再转过来决定上层建筑的内容、改变人们的思想，使它们尽量能符合已存在的公有制。由此，我们又可进一步看到：上层建筑是不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自动改变的。它的转变还得靠人的自觉行为，靠主观能动性的努力。同时它又是与经济基础发展息息相关的。不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那末，新的思想会变日，旧的思想会更猖狂。它一旦成为主流就会反过来侵蚀生产

资料公有制，并摧毁社会主义整个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形下，经济也可以发展下去，但发展的方向就背道而驰了——再回到私有制，意即复辟资本主义。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二十六年来，中国从未停止批判含有私有观念毒素的新、旧文艺、戏剧、绘画等，这说明了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看到自觉改变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及正确的思想对促进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抓革命，促生产”）。

但是正确思想只有几个或几百个干部或学者掌握，还是不够的。正确的思想必须普及让人人都能通晓，这样才能形成力量。为此，群众路线就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只看一面，认为中国搞水利、建大桥，动辄动员人力几十万，这就是群众路线。更重要的是全中国所有的劳动者都在学习，都要搞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懂得如何在实践中应用。今天几亿中国人这样勤奋地学习，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进作用，且对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发展也有不可限量的贡献。象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古国，能如此认真地学习马克思那一整套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东西文化交流中一件大事。其认真之处就在能普及，在讲应用。目前，中国人都在学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去分析事物并掌握其发展的规律，且在实践中用来克服种种困难，征服了灾害，提高了生产，批判了“孔孟之道”，讲清了两条路线斗争。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单是儒法斗争这一项就使很多海外知识分子跟不上了，何况在国内每人还得学点政治经济学、《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我们可以肯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会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我们不否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时会出现曲折、缓慢地发展，也承认这是多少与搞革命有关。但在革命中教育了几亿人民，使他们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世界观，

学会了当家作主，这是比一年增产一百万吨钢更有意义的。而在一个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里，这意义就更大了。因为在那里，每个人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应学会去管理生产，去过问国家大事（政治），去监督经济核算……要不然公有制就只会有名而无实。只要公有制存在一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个客观的需要。谁不这样做，他就是违反着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也是为什么要不停的反“专家治厂”、反官僚主义的原因。

存在的问题

这样说，是不是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了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还有很多问题必须解决。因为中国还处于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单是缩短工农与城乡的差距就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同时，思想问题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其所以如此，有下列三个原因：

第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价值范畴如货币、价格、利润、交换价值、消费价值等等，仍有相当的作用并时时刻刻在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换句话说，在过渡时期里，按劳分配、商品制度等，仍将长期的存在，而这些又都必须以货币作为媒介方能畅行。于是，金钱就仍有着一定程度的“魔力”；为钱做事，看钱办事，以钱量事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人和人的关系在很多地方也会多少因此表现为钱和钱或钱和人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仍有人那样的自私，为自己打算，总想升级多赚点钱就不足为怪了（中国目前仍有八级工资）。就是企业单位、商业机关、公社、大队也因为用货币（价格）核算成本、利润，常会“利小小干，利大大干，无利不干”的。金钱的存在支配着人

们的意识，这就使思想的革命化、世界观的改变等增加了困难。一方面要承认金钱、商品、价值等在过渡时期有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去正确的处理和对待这个存在。对个人来说，他既要承认工资差别意即按劳分配的必要，又要经常不计报酬为人民服务，为革命而工作。对企业、公社等来讲，它们既要精打细算去创造更多的利润（积累），又要不惜工本去支援兄弟单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生产。这些都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真不容易的。

几千年历史过程中留下来的价值范畴，不可能一下子把它消灭是有理由的。譬如按劳分配就要用钱付工资，工农产品交换要以货币作为媒介，工人、农民购买消费品也得照价付钱，还不能按需分配。再有，国家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也得靠价格政策去影响和控制。假如购买自行车的人太多而产量又不丰富，就提高它的卖价使人望价而止。收音机产品充足，就降低它的价格，让大多数人都能买到。为增加农民的收入，政府一面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另一方面降低工业产品的售价，这样也使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逐渐缩短，等等。事实上，农产品的收购价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二十年中，已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九十，工业品如医药在同一时期内，就平均降低了百分之八十。农民从中获益实在不少。可见，价格和价格政策在今天仍有很大的用处。问题在如何正确地去掌握它，运用它，而不是去消灭它。

但是，价值范畴的存在也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有了金钱就可能有“物质刺激”，有利润就难防某些企业或集体单位不“唯利是图”……而这一切又都会反映在党内政策的制定上，形成鲜明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斗争将长期的存在，直到社会主义获得最后的胜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停止。因为只有

共产主义社会里，按劳分配将被按需分配取代，那末，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等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价值范畴也将如其他一切的历史范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组成生产力的成份，除工具外，最重要的是人的劳动力。工业愈落后，人力就愈重要。而人的劳动力却不是孤独存在的。它是客观的存在于人们自己的身体内，因此，它又是受人的主观意识所支配的。世界上也只有人才是主、客观合于一体的。因此，人的劳动力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此时，劳动力就是商品。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对自己的劳动力作不了主，所以他是痛苦的，只希望八小时尽快过去，回家好做“自由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同样必须工作，但他不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在工作时间内，他既工作又能参加企业管理，讨论业务，设计产品，甚至进入厂办大学学习（如上海机床厂那样）。因此，工人有热诚，有兴趣，对工作肯卖力。当然，这也不是在革命成功后一蹴而就的，而是渐进的，是经过不断斗争而得来的。这点我们将在第三个原因里作进一步的讨论。

既然人的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的主要部分，那末，要动员劳动力（客观）参加生产，首先就得动员人（主观），而要使动员了的人能积极的工作，就得进一步先提高人的觉悟及政治水平，否则就算有了一大群人也做不好工作的。这样，我们就会更明白为什么在此文开始讨论经济政策时，一再强调思想的重要性的原因了。同时，我们还得进一步去审视人的主观意识及其对劳动力私人占有的观念，是如何受着不同社会制度的影响支配的。简单的说，在一个奴隶社会里，奴隶的人身已属于奴隶主了，他的劳动力当然也百分之百是属于奴隶主的。除了终生象牛马一样地替奴隶主做苦工外，完全不可能自己作主或靠自己

的主观意识去支配自己身上的劳动力的。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在封建社会里，情形就不同了。农人租了地主的地，除交租外，还有一部分产品是自己的（譬如百分之五十）。那末，他的劳动有一半是属于地主，另一半则是属于自己的。可是，在佃租过高和劳役很重的情形下，佃农也会经常处于半奴隶的状况，同样无法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一遇天灾人祸，就会立刻无求生之地，甚至弄到卖儿卖女，使自己再度沦为奴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农人被迫失去了生产工具——土地。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已一无所有了。但他却因此“自由”了，劳动力完全是他私有的了。他可随时出卖他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几小时、几天、数月、几年都行。当然，在工作时间内，他将听任资本家支唤使用，完全不能自己作主。一旦进入社会主义，私有财产制度虽被铲除了，但劳动力的私有仍存在于人们主观的意识里。加上按劳分配、自留地的存在、儿女教养费大部分由家庭负担等，就很难使人们对自己的劳动力不视为私有。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下乡去做农民，多少仍会引起他父母的反对。因为双亲辛苦地付出了大部分教养的费用和时间，总希望孩子升大学，将来多赚钱。一个大学教授下乡或工程师下厂会感到难堪，他们总觉得这是委屈了他们经多年培植起来的专业劳动力。这些现象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法权”在作怪。究其根源，则是人们仍以劳动力为私有，劳动主要是为私，也必须求得适当的报酬。这就同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和国有化有了矛盾。所以要大力提倡“破私立公”、“为人民服务”及“为革命工作”等，去改变人们对劳动力私有的这一现象。相反的，也可能采用苏联现行的办法，用金钱去刺激人们工作，让大学教授治校，让专家治厂。这非但不能根本地解决问题，反而更加强了劳动力的私有和劳动为私的观念，更凝固了按劳分配这一分配原则，

当然也将助长了“金钱万能”的威风。那末，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最后将落得有名无实，被压在下面受苦的仍将是劳苦大众。可见，要改变思想，要提高人们的觉悟，在过渡时期中是如何的重要而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第三，是刚才已提到过的工农是否真能当家作主的问题。首先要明白当家作主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今天也不是全国一致，十全十美的。它同时表现为人和人的关系，又是生产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生产关系在未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不会完美无缺，必须不断地改进，而人和人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构成部分，当然也不会完美，也要不断地改善才行。加上人和人的关系在一九四九年前是那样的恶劣，它的遗风流毒也不是在一夜之间可以清除的。所以，去旧更新在此也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譬如在文革前，工厂里实行的是厂长制，是专家治厂。在那种情形下，工人除了做工外，并无参加业务计划、行政管理、经济核算的权利，上大学就更不用提了。这样，即使没有私有制，也没有资本家，工人在工作时间还会同样感到痛苦的。因为这不符合公有制，工人们也就没有作主人的感觉，做工当然不卖力气。文革中大力推行的“鞍钢宪法”，就是针对此症下药。它规定了工人要参加管理，干部要下厂劳动，不能脱离生产，不能脱离群众。这就替工人的当家作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要确实掌握这些条件，达到真正当家作主这个目的，工人们还必须进行不断的斗争。一天工人不能真正作主人翁，那末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的。若是以为可以靠金钱去刺激工人们工作，就又会走上苏联现行的道路，收效不过一时而已。因为从长远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及整个生产关系不可能靠金钱去改善，相反的，整个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会因此陷于停顿，甚至倒退。

上面提到的这三个原因，看来似乎是非经济性的，却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幸而中国的领导人早已看清了这些问题，且正在面对现实地去解决它们。这样，再配上正确的经济政策，双管齐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远大的，其发展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在八十年代，我们就可以看到显著的成绩。

（原载香港一九七六年一月号《七十年代》杂志）

退回到利润的老路上去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修正主义的发展

〔西德〕菲利浦·瑙曼

〔内容提要〕本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第一部分介绍东德的所谓“经济改革”的前后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东德的那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经济路线，完全是苏修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难怪作者要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样的情况要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经理身上，倒不使人惊奇”！文章的第二部分分析了一九七〇年东德经济严重失调的原因，作者认为，这是东德推行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企业自治、专家治厂为内容的修正主义“经济改革”的直接恶果。

东德的新经济体制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党内的右派分子利用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在苏联出现的政治困难和经济困难，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把一条修正主义的总路线强加给苏联共产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与苏共保持着特别密切